

墨遗塘方谢



遵义历史文粹（四） 谢方塘遗墨

出版：遵义市政协宣教文卫委员会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开本：210 × 285mm 1/16

邮编：563001

印数：2000 册

电话：0852-8639118

印张：3.25

电子信箱：Xie123Lin@YaHoo.com.cn

时间：2006 年 10 月

印刷厂：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 0755-83254187

本书如有装订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厂方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遵义不仅是革命历史名城，也是人文荟萃，名家辈出之地。尤其近代，更是遵义文化繁荣与昌盛的时期，其间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如郑珍、黎庶昌、莫友芝等，使黔北这片土地闪烁着文化的光辉，难怪时人会发出“贵州文化在黔北”的感叹。遵义清末八大书画名家（王藻章、陈启绪、晋铨章、蹇念勋、谢方塘、付弼、方锡纯、曹欣余）之谢方塘，书画兼长，尤以墨兰竹闻名当世。方塘先生成名于北方，桑梓地方反而对他不甚了解，只是知名而已。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宣传贵州、宣传遵义，我们将征集到的谢方塘先生的书画作品以选本形式出版，定名为《谢方塘遗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和工作，今天终于付梓了。

《谢方塘遗墨》的出版发行，得益于谢氏后人无偿提供家藏的所有谢方塘资料。谢氏书画保管人谢以恒先生此次专门撰写回忆文章，讲述这批资料保存至今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与周折，更显弥足珍贵；而由谢以恒之父谢德由先生于八十年代中期撰写的文史资料，使读者对方塘先生的身世以及艺术追求有了大致的了解。但由于资料匮乏加之时空久远，我们对这位才华横溢、成就斐然的艺术家知之甚少，尤其他的仕宦经历、进步思想等等，几乎是一片空白，有待今后进一步搜集整理。现在，我们只能从一张张宣纸中去感知他的精神世界与生命的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该选本着重介绍的是方塘先生的水墨兰竹，同时收录部分书法和篆刻作品。其中许多兰竹作品，采辑于方塘先生的《蚓笛斋兰竹谱》。此画谱是清代水印珍本，艺术价值很高，保存亦完好。鉴于它的学术价值，今后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出版。

为作好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分别邀请了寓居遵义的贵州省文史馆精通书法与绘画的周树心、胡炳煊两位馆员，对我们搜集到的谢方塘书画进行鉴定与赏析；而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更是得到了贵州省政协《文史天地》杂志社美编杜宁先生的大力协助，承担此书的封面装帧设计和画件的翻拍、筛选工作，并提出很好建议，使此书更臻于完善；同时，贵州省博物馆、遵义市图书馆亦给予大力支持，毫无保留地提供馆藏的全部谢方塘书画资料；还有遵义刘轩先生无偿提供其祖父刘伯庄收藏的谢方塘画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该选本是作为遵义市政协文史资料之“遵义历史文粹”系列编辑出版的。此前这一系列丛书都以文字形式面世，而这一次以图片形式出版，是我们对文史资料工作的一种尝试。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必然存在一些未尽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谅解。

编者

2006年7月



谢方塘的墨兰竹及其轶事

谢德由

先伯祖父谢方塘公，名鉴礼，号半亩山人，方塘是其字。生于1850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朱熹传颂千古的名篇《方塘》，方塘以朱熹之诗取名，可见对朱熹的崇拜。方塘公成名于北方，遵义家中，遵义地方，对他的书画流传的反反而很少。他的身世，虽说就在他的“桑梓”地方，现在能知道的人，恐怕也是不多的，只以“遵义清末八大书画名家（王、陈、晋、蹇、谢、傅、方、曹）齐名并提，知名而已。他书画兼长，特别以墨兰竹闻名当世。现在我便从他的墨兰竹谈起。

方塘公从小喜好书画，但家贫，无力购买“丹青”彩料，习画便只好以“水墨”为主了。穷人家的生活环境中，接触的兰、竹最多，“故得于风前月下，雪后雨余，徘徊瞻眄，以挹其清芬逸韵。”（《蚓笛斋兰竹谱自序》语）在同样情况下，再结合当时地区的偏僻落后，买置画谱书籍，是不可能的，因此，对画墨兰竹就是见闻少而独创多。诚如他在画谱的自序里所说：“无师承以传授其秘诀要道”，这也是他的绘画风格自成一家的基础。虽然在他的《竹谱侯序》说，他师承湖州、板桥，但也未必如此。文湖州首创墨兰竹，我没有见过湖州的墨兰竹作品，不敢妄加比较。郑板桥的竹，却是纤碎为主。方塘公画竹，则是豪放刚劲，潇洒清逸，显然和前人大相径庭。公早年习画，曾以《天下有山堂》（汪体斋画谱）为宗，该谱说，嫩叶为浓，老叶为淡，而公的画竹，则求整个画面结构的平衡协调，浓淡适宜，增强了画面的透视感，而又不囿于汪谱的成法。体斋又说，“墨竹……无‘神品’，便不成竹”，但公画墨竹，却是“神形兼备”，可见是学古而又不泥古的。“询所谓集古今之大成”而自立门户，确是中肯的评论。

当他在习画时，正因为家贫，纸张笔墨的供应不是能够顺意的。得钱，宁愿用来买置书籍。习画，则就以桌面或自制的专用木牌代纸，以水代墨，每于读书之余，就临桌蘸水作画，画了又擦，擦了又画，并不受少纸缺墨的困难障碍。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水墨画”了。就这样，凭了一个恒心毅力，勤奋努力，终底于成。我父亲常常以这事迹来勉励我，在我儿时的心灵中，留下一个深刻印象。

方塘公祖籍江西，清朝随其父辈迁入遵义，入黔后安居在遵义八里乡的茨坪，传近十代。到公的父辈伯昭，这时正值清王朝晚期，政治已是极端腐败，对劳动人民剥削残酷，农村破产崩溃，伯昭公只好逃离农村，到城里一家帽店当学徒，做手艺求活。反正做帽子需要的本钱不多，后来稍有积蓄，也便自己做起帽子生意来。名其小店作坊叫“谢天成顺记”（这店名也是双关用意的，“谢”，既是表明店家姓氏，“谢天成顺”又是表达了感谢上天恩赐顺利成活之意）。伯昭公有子四人，长子名衡山，早年在困苦中夭折，第三子名柚坪，做行商出外下落不明，四子名竹君，（就是我的祖父），随其父从业做帽。方塘公是第二子，自幼聪慧，好文喜画，便得脱产培养。那时在一般农民局限性的和淳朴的思想中，以为贫穷困苦，都是不读书，没官势所致，常幻想着能有子“成龙”，做官入仕，便能光大门户。公举进士后，也因无钱贿赂当道，一直在京候补多年（那时正值清王朝卖官鬻爵，甚至明文“厘定官阶价值”规定，把官阶也已商品化了的年代），最后算以“二品即补道”虚衔，降格当了保定府清苑县的县知事。不久便是辛亥革命了。

他在县令任中，清廉爱民有政声。这时又是帝国主义殖民者欺凌中国，蹂躏京畿的年代，当时大部分京畿官员，以及清王朝内部，都是恐洋媚洋的，而公则以正义爱国心情，常怀以身殉国的意愿。所

以,《兰谱周焕章序》说:“方塘爱民有惠政,治绩蔚然。其足以不朽固自有远且大者在,岂特区区翰墨哉!”《竹谱侯汝承序》也说:“吾愿后之师承方塘者,……岂徒在区区图画间耶,第即其画竹之一端,亦可见方塘之劲节云。”他们无不是在盛赞其画的同时,都必然颂扬其作者的品格风貌。

1985年底,荣宝斋出版的,由新公款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的《楹联墨迹选集》中,选登了方塘公的一幅对联:“题诗雅有高人和,吹笛闲寻野鹤听。”又其自饰书斋一联云:“聊把新诗教鹦鹉,戏拈秃笔扫骅骝。”可见他当时身处在污流浊泥的官场环境中,很难找到共同语言,只好寄身诗文书画,“野鹤听”、“教鹦鹉”,以抒发自己情怀,向大自然诉说自心的忿懣。他死时是民国二年(1912年),我父亲去“奔丧”,知道死时是在“保定高等警官学堂”校长任内。正所谓“客死他乡”,无力归葬。当时是以“归葬”为传统习惯的。无钱归葬是受人讥议的。一个文场进士任重要武职,显然是参加了革命军,否则,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可惜我父亲文化水平既低,处在穷乡僻壤,在传统讳言政治的社会环境薰染里,我小时也就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谈及方塘公参加革命的事。这就厚望于有能知其翔实的人士,有所见教于我们了。

1986年5月



一生的心愿

谢以恒

我虽然自幼喜爱书画,也从父母口中知晓家中保留得有先辈留下的书画,可父母既不允许我们当子女的了解详细情况,又不允许我们去翻看。因为在那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加之三外公杨兆麟又是遵义有名的“杨探花”,透露出去是要惹麻烦的,搞不好还会带来灭顶之灾。就这样,先辈谢方塘的名字及其书画一直静悄悄地封存在箱子里。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父母见我们长大成人,才允许我去翻看,我这才将这部份书画“占为己有”。1963年参加工作以后就没有更多时间看了,仍就放在楼上我住的卧室里。因为是租住房,楼上也很简陋,瓦下也没有顶棚,为了不让字画染上灰尘,装画的木箱上我还用油纸盖住。没想到在1963年那场灾难性的冰雹中,瓦房被冰雹打得到处是洞,带着瓦灰的雨水流下来浸入装书画的木箱里,将部份字画浸湿得斑斑痕痕,我只好悄悄地在楼上把被浸湿的部份晾干,给我留下了深深遗憾。

1966年5月,我接原市委工交政治部通知,在工人俱乐部集中学习了大约半月,市领导说党中央毛主席要搞文化大革命。学习结束后,我便被派往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到了年底,南下学生到遵义“点火”,号召大家起来造反,不少单位陆陆续续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我也参加了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委员会”,因此落下了“忠实执行资反路线”和“保皇头目”两个罪名。一天,造反派与串连学生把我家围得水泄不通,吵吵闹闹要抄我的家。我急得团团转,因为祖宗留下的书画、信件等在当时是属于“封资修”、“四旧”范畴,若被抄走,一把火便给烧了。还是母亲冷静,悄悄地说:“你何不去找派出所?”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以上厕所为由从后山直奔派出所,派出所龚指导员和陈所长听了后说:“你先回去稳住他们,我们随后就来。”我回家后,母亲说书画她已经用我的衣服盖好了。我对造反派头头说:“抄家可以,但必须有见证人。”随即龚指导员与陈所长带了两个民警赶到,告诉他们抄家必



须有公安机关的搜查证。我说：“这样吧，龚指导员，他们怀疑哪里藏得有执行资反路线的黑材料就说出来，我翻给他们看行不行？”龚指导员说可以，造反派头头只好同意，就这样指了几个地方，我翻给他们看了，都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只好说：“算了，算了”，就带着造反派和红卫兵走了。走时还扬言总有一天要再来抄过。母亲说，赶紧把那部份东西清一下，不能留的就不要留，以免节外生枝。于是我们便把方塘先生在保定直隶府供职时的往来信件以及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方塘先生穿了朝服与一个德国人的照片，左上角标有“帮办谢鉴礼”，右上角标有“帮办助理韩纳根（译音）”，连同三道圣旨等全烧了，只保留了书画。

后来我为了不给造反派来家的借口，干脆连家都不回了，成天在朋友处躲藏。到了1967年初，我还是被造反派抓住，直接押往丁字口原遵义饭店门口搭的台子上用钢钎押着批斗，母亲得知后直往市武装部找到王传福政委，王政委才派人把我从会场趁混乱之机“抢”了出来。“夺权”以后，省革委徐英莲到遵义，说：“贵阳工纠在挨斗，遵义老宣可自由，”准备在遵义大斗特斗“老宣”头目。遵义军分区王巨胜副司令员立即派人通知我外出躲一躲。我立即将书画用床单包好打成背包形状，趁天黑坐火车逃往贵阳，贵阳再乘汽车到清镇林夕我父亲单位躲藏。

我在父亲单位躲避过程中，才有机会从父亲口中得知我家能有这部份书画的原委：1912年（民国二年），曾伯祖父谢鉴礼（方塘）在河北保定去世，当时在遵义的亲属有两房人，即我家与堂伯家，两家都派有亲人同去保定。我家是爷爷带着年幼的父亲去的。在保定安排完丧事后返遵时，各家都分有部份书画，《兰竹谱》总共才印有四套，各家只分了一套。1935年工农红军长征过遵义时，因为对红军不了解，全家躲到乡下。红军走后，才发现放在家中的书画被看家的人盗去了部份。解放后土改时，堂伯家被划为地主遣送农村，财产亦被没收，所藏书画荡然无存，只有我家才得以保留下这部份书画。

1969年底，0278部队进驻遵义，对原遵义市革委补台，我才从清镇返回遵义，在市革委清队办（后改为一打三反办）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市图书馆骆家道同志得知我藏有谢方塘的书画，便邀约文化馆领导杨田力找我，说他们可以高价聘请浙江高级修补裱褙师来裱这批书画，由国家出钱，仍归我自己保管，只是他们需用时，再从我这里借去。当时我父亲认为这种无保障的“私藏公用”的保存方法弊端多，就以方塘先生家训“家藏不足教之国”为由婉言谢绝了。本来这部份书画，历时百年，长期没有得到精心保护，加之1963年冰雹袭击，虽然晾干，但仍留下不少瓦灰迹印。自己虽经常抽空用油画笔慢慢清除，斑斑水渍却永存。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政协委员、苏州画院名画家谢孝思老先生夫妇来遵义住湘山宾馆时，没好意思将书画让谢老看，只把保存较好的《兰竹谱》请他们欣赏。谢老非常高兴，看了“兰谱”，连声赞道：“不错，不错。”在翻看“竹谱”时，即对其夫人说：“淑华，来，快来！你是画竹子的，来看看谢方塘画的竹子。”二人边看边称道：“这竹画得不比郑板桥的差，我看有些地方比郑板桥画得还要好。”并再三叮嘱我要好好保存。

尽管我是国家公务员，爱人是教师，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工资仍很微薄，无力将这部份字画翻裱，但如不翻裱，对其保存极为不利，一旦损坏，既对不起祖宗，亦对不起后人。后与爱人商量，再拮据也得省出钱翻裱，资金不足，就一次三幅五幅地裱。所以，直到退休才将所存书画全部装裱完。

大约在1996年，市图书馆李仲刚先生曾与有关部门协商，想为先辈方塘先生出版一本书，并在我处选摄了部份书画，与有关资料一并寄往江苏扬州出版，无奈当年因为暴雨成灾，扬州被洪水袭击，所寄资料亦遭损失，未能出版。

这次承蒙遵义市政协的精心策划和不辞辛劳搜集资料，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终将此书编成付印，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我们作为谢鉴礼（方塘）后裔，借此一角，表以真诚谢意！

2006年7月10日于遵义



表臣母兄親家大人 策正
癸巳夏六月 子璠 謹識





墨兰屏 137.5 × 35cm







墨竹屏 137.5 × 35cm







山翠萬重
當檻出



白蓮千原
映廊明

方塘謝泓漢



山翠白蓮行书联



墨兰图(绢本) 63 × 36.4cm



兰石屏





行书诗扇面 17.4 × 49.4cm





孝子好子然其來習者乃粗不獨
 要隨而之世不一性乎從之之之
 以法雅未窮於家術所可極於仁

云之際人者何老仲尼云吾年知命
 七十從心所欲不違矩矱之情禮權變
 之有

乙未夏月 謝方塘 謹識

草书屏之一

信其美且通於少、而老、學、生
 規矩者、不、如、少、且、則、老、之、通、妙、者、如
 少、而、不、勉、之、而、勉、者、三、時、於、一、交

極其分是主の初字分希但求主正
見其手正初也信ね其能信ねは
其手正初也其手正初也其手正初也